

实证九千年中华玉文化^{*}

——“小南山玉文化论坛”纪要

赵曾健

小南山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饶河县乌苏里江畔，曾入选“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我国东北地区重要的考古遗址。小南山文化第二期遗存以成规模墓地和大量玉器为突出特点，遗址出土玉器总数已超200件，年代集中在距今8600—9100年，揭示了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玉器组合面貌。

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玉文化论坛（二）——“小南山玉文化论坛”于2024年6月22至23日在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饶河县召开。论坛由中国文物学会主办，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饶河县人民政府和故宫研究院玉文化研究所共同承办，来自40余家文博单位、科研机构和高校的百余名代表出席了此次论坛。论坛期间，与会学者重点围绕小南山遗址出土玉器、小南山遗址生业模式以及玉器研究领域的前沿问题展开充分讨论，实证了九千年中华玉文化。

（一）论坛开幕式

论坛开幕式由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故宫博物院玉文化研究所所长徐琳主持，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陆琼，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文物保护与考古处处长张云鹏，双鸭山市委常委、饶河县委书记姜宇峰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徐琳主任委员在发言中回顾了“良渚玉文化论坛”取得的成果，并预祝本次论坛能够取得引领学术前沿、继续推动玉文化深入研究的效果。陆琼副会长强调，中国文物学会将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通过考古发掘与研究，不断阐释文物价值，突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大局意识，坚持学术为本。张云鹏处长指出，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黑龙江省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取得了许多成果和重要收获，尤其是小南山遗址的考古新发现，进一步凸显了黑龙江在中华文明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姜宇峰书记表示，“玉破天惊”的小南山遗址吸引专家学者们齐聚饶河，研究、宣传小南山玉文化；饶河县委县政府将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保护好小南山遗址及出土文物，在保护第一的前提下加强文物资源利用，让文物“活”起来。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实地参观了饶河县博物馆与小南山遗址，并观摩了小南山遗址出土玉器。

（二）主旨发言

主旨发言环节先后由北京大学教授赵朝洪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主持，十余位学者从多元视角展开对于小南山遗址出土玉器以及中华玉文化的综合研究，对于小南山遗址出土玉器的玉料、工艺、内

^{*} 本文为故宫博物院英才计划成果。故宫博物院英才计划得到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公益慈善研究院独家捐助，在此特别鸣谢。

涵、影响以及中华玉文化起源等重要学术问题作出回答。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馆员李有骞的报告《小南山遗址的考古发掘收获》，详细梳理和介绍了小南山遗址的发掘概况、重要发现以及主要意义。他指出，2015年以来，小南山遗址发掘总面积近2700平方米，出土玉器140余件。目前可将小南山遗址史前遗存分为五期，其中玉器集中出土的第二期文化遗存距今年代约8600—9200年，建议将该期遗存命名为“小南山文化”。同时，报告从三个层面阐释了小南山遗址玉器发现的主要意义：首先，其为探寻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新的实证和补充；其次，其为研究中华文明提供了新的视角，让黑龙江流域史前考古获得学界重点关注；最后，小南山遗址通过9000多年前的实际案例与玉器传承，为思考中华现代文明的形成和构建提供了新的方向。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郭大顺的发言《再谈玉器的起源与渔猎文化》，以小南山遗址出土玉器为例，论述了玉器起源与渔猎文化的关系。报告认为，中国史前文化存在三大文化区域，其中以渔猎为主要经济活动的东北文化区最早出现玉文化并非偶然。渔猎文化擅长用细石器，对石料的硬度、纹理、结构、色泽等均具有成熟认知，具备从中辨认玉的能力。渔猎文明出现玉器加工技术的三大优势在于：对旧石器时代文化积累的直接继承、对大自然具有较高的敬畏和尊重以及具有文化开放性的特征。小南山遗址玉器的发现进一步证明，早期玉器已具“通神”功能，实现了玉石分化，玉器的起源确与渔猎文化密切相关，东北地区是“中华玉文化的摇篮”。

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教授邓聪的报告是《小南山与东北亚最早玉石之路》，主要从东北亚早期玉石之路的视域下论述了小南山遗址出土玉器的重要意义。报告认为，早期玉器在东北亚的传播发展，是由西而东经过阿尔泰地区、贝加尔湖周围至中国东北黑龙江形成三个核心发展地区。在将小南山出土玉器与马耳他、俄罗斯、日本等地出土的早期玉器对比后，邓聪指出，小南山遗址考古发现一方面冲击我国传统新石器时代的概念，另一方面也将对东北亚地区晚更新世至全新世初期的考古产生重大影响。距今10000年前后，黑龙江中游一带发现的玉块耳饰、璧形器、玉管、玉珠、匕形器等，可视为东亚真玉文化的产生，是玉文化的革命性变化。

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邓淑苹的报告是《圭璋礼制与小南山玉斧的启示》，她在系统梳理考古资料的基础上，指出“圭璋礼制”是从史前玉质带刃器发展而来，并对小南山遗址出土玉钺的使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玉石钺资料记载约公元前3300—3000年出土于庙底沟文化晚期的陕西华县泉护村第701号墓以及灵宝西坡墓，其不装木柄、刃端向上，器身与墓主平行摆放，是年代最早的礼制化的“平首圭”。商周之交，从玉戈发展而来的尖首圭成为玉礼器的主流。小南山遗址出土的玉钺，将玉质带刃器的时代提早了2000年，而史前东北流行的不加孔的垂梨形玉斧应是直接用手握执使用。随着气候干燥造成草原化，玉器文化逐渐没落，东北地区并没有发展出“命圭”或“圭璋”礼制。

南华大学副教授江美英的报告《小南山玉环璧在中国玉文化启后的关键性影响》，论述了小南山遗址出土玉器尤其玉璧在中国玉文化史上的重要影响。报告认为，小南山遗址出土玉器不止将史前玉文化向前推进到距今9000年，而且丰富了玉器的造型序列。陶寺遗址出土组合头饰的玉料可能产自东北地区，同时刃边玉璧的制作特征也受到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影响，这种审美特征可追溯到小南山文化。小南山出土玉环璧，对中华玉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复旦大学教授王荣的发言《生命史视野下的小南山玉器初探——以2015—2017年出土玉器为例》，汇报了该研究团队近年来在玉器生命史视野下对2015—2017年小南山遗址出土的73件/组玉器的研究成果。研究团队运用拉曼光谱仪、X射线荧光光谱仪等科技检测设备采集并分析数据，研究结果显示：这批玉器由7种材质构成，其中透闪石材质占到一半以上，且设计、制作水平较其他材质更高，表明小南山先民已具备玉料辨别能力；玉器的加工工艺和流程已较为成熟，部分透闪石玉器出现了连缀、改制等修复工艺；且玉器在入土前多经历佩戴或使用。关于小南山玉器之“源”，报告认为或可追溯到东北亚地区长达3万年的维度。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杨明星的报告《小南山遗址出土玉器矿源思考》，在总结我国透闪石矿源地面貌和特点的基础上，对小南山玉器玉料来源作出解释。报告介绍了透闪石玉的成矿条件、产量、品质标准、矿点分布等相关情况，认为中国透闪石玉矿源地具有点多、面广、变化快等特点。结合我国古代出土玉器特征，报告指出中国出土透闪石玉的利用分为“就地就近”与“西玉东进”两个阶段，倾向于认为小南山出土玉料符合“就地就近”利用原则，即遗址周围数百公里存在成矿条件。在无法找到明确矿源的情况下，建议对相近时间相近地区出土的玉器玉料进行分析，并加强就近矿点考察工作。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陈克恭的发言《玉琮何以能载道——玉琮中的方圆》，尝试引入数学思维逻辑，分析玉琮方圆关系中的哲学逻辑。报告认为，“天圆地方”的理念不应被狭义解读，因为 π 的存在，圆的周长与面积是“无理数”，与古人用以指代天的“无穷”概念相近，符合哲学逻辑。数学中的几何具有真理性，玉琮中的方圆关系恰好体现了古人的哲思，是人类认识自然、融入自然的产物。古人为玦制作缺口，也可推测为受 π “无法除尽”特质的影响。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张润平的报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新石器时代玉器综述》，汇报了对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新石器时代玉器文化类型、品种、造型、纹饰、功能及内涵的梳理与研究成果。报告认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新石器时代玉器藏品数量丰富、种类繁多、品质上乘、制作工艺精湛。新石器时代早期玉文化特点以装饰品和通神法器为主，体现出远古先民的审美意识和虔诚的宗教情怀。

徐州博物馆研究馆员李银德的报告《西玉东输中的“敦煌玉”——以敦煌汉简为中心》，指出敦煌是汉代国家玉料储存中心，“敦煌玉”应包括敦煌周围开采的玉料和以于阗为主的朝贡玉料。报告认为，敦煌效谷县有多里居民以开采玉矿为主，形成玉里特色。敦煌的“西玉东输”，应是利用其到长安的丝路驿置转输，而非远程输送，玉门关地名或与“西玉东输”无关。

（三）自由讨论

自由讨论环节由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故宫博物院玉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徐琳及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张尉主持。数十位学者先后围绕小南山遗址及出土玉器、小南山遗址保护与研究、跨学科及跨地域的考古合作等问题展开讨论，不仅从多个角度挖掘和阐释了小南山遗址尤其是出土玉器的内涵，高度评价了小南山遗址出土玉器在中华玉文化、中华文明中的重要意义，也为小南山遗址及出土玉器下一步的保护与研究提出了方向、建议。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明达认为，小南山遗址出土玉块数量庞大，具有重要意义。玦既是出现最

早、传播最广泛的玉器，同时也是中华文明“万年起步”的指示物。玉玦不仅对研究中华玉文化具有特殊意义，也是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重要特征。小南山出土玉玦在制作工艺上主要采用线切割，未见明显片切割或管钻痕迹，玦的缺口制作则可能存在三种不同的切割方向。作为中华文明“万年起步”的地方，小南山遗址意义重大。

北京大学教授赵朝洪指出，小南山考古发现为新旧石器过渡阶段及划分标准、玉文化起源、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进程、早期玉器产地等方面研究提供了新角度。他同时认为，小南山遗址考古下一步工作应重点加强遗址保护与价值阐释，关注不同层级墓葬的特点，探寻其背后“文明”形成的内在逻辑。

上海大学教授徐坚基于过程主义考古学理念，提出应从自然和社会两个维度的“适应性”理解小南山遗址和玉器。在自然适应性上，小南山遗址代表了密林湍流环境下的富裕渔猎采集经济类型。小南山遗址或只是季节性使用，各阶段可能是生计方式相同的不同人群形成的。在社会适应性上，玉器是一种集中表达社会身份标识和文化归属的器物。早期玉器的传播不一定代表人群的迁移，还可能伴随了思想的传播或脱离原生环境的“威望财”或者“库拉”扩散。早期玉器的加工手段需和黑龙江流域及贝加尔湖一带的黑曜石、猛犸象牙、琥珀加工联系起来。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方启强调，黑龙江不是一个文化贫瘠的地方，小南山遗址周边一定存在其他重要遗存，建议命名为“小南山文化”。后续应加强黑龙江流域考古领域的国际合作，将小南山与周边遗址进行对比，系统发掘其间的内在联系。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戴向明指出，从已知材料看，东北亚地区是组合玉器的发源地，小南山则是成熟玉文化的集大成者，本地区还应加大组合玉器传播路线的寻找力度。基于玉器功能的变化，他指出早期玉器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万年前后出现的饰玉阶段、红山文化时期开始的通神工具阶段以及东周以后的世俗化阶段。

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研究馆员庄丽娜指出，不同区域的新旧石器时代过渡标准不尽相同，与本区域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建议后续研究可以关注小南山遗址人口季节性迁移、玉器产生的背景、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房址墓葬对应关系等方面。玉器的制作技术同细石器加工技术存在明显区别，如果小南山玉器与使用细石器的人群密切相关，其制作可能并非于本地完成或由非本地人群完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易华指出，玦、璧的产生可能与日月崇拜有关。小南山玉玦到红山玉龙有一脉相承之处，但其中的功能或象征意义则已有明显不同。进入青铜时代，金属龙有取代玉龙之势，金玉交融形成“玉魂金魄”，玉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特色，金是人类文明的共性，金玉结合才是中华文明的最佳概括。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薛新明提出，发现小南山玉器制作技术相当成熟，已经可与距今4000年前玉器相比。若以小南山命名考古学文化，不能只发现小南山一处遗址，小南山文化应当代表同时代的区域性文化面貌。发现同时代、同文化的其他遗址，可以有效打破小南山遗址考古的局限性。

天津博物馆研究馆员徐春苓认为，根据目前国内科学考古发掘资料，玉玦、玉匕形器的出土以小南山遗址最早，其影响辐射到东北、燕山甚至更远地区，如兴隆洼遗址、查海遗址都有发现。20世纪70年代在天津市宝坻县牛道口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土6件玉玦、4件玉匕形器，其玉质、形状、沁色与查海遗址出土玉器非常相似，应同属7000年前的器物。小南山玉器类型影响到燕山南麓的天津宝坻地区，玉玦、玉匕形器作为玉器组合传播久远，很值得学术界关注。

内蒙古博物院研究馆员于宝东提出,内蒙古东部出土的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玉玦和玉管形制与小南山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小南山文化对辽西、内蒙古东南部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影响问题仍有待更多的发现与探讨。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曹兵武评价,小南山遗址一期已经出现陶器、房址等遗存,石器制作技术非常高超,且早于出现玉器的二期遗存数千年,其内涵不仅为玉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基础,也为有效揭示同时期很多全球性重大问题提供了线索。

南京博物院研究馆员田名利认为,小南山遗址依山临水,与凌家滩、牛河梁、良渚等遗址环境相似,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崇高崇玉、祭山祀水意识的形成存在联系。小南山玉器相对标准、规范、成熟,砂绳切割、实心钻孔、断裂连接、成形对开等制作工艺对后世玉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小南山遗址的研究不仅要关注玉器本身,还应关注玉器与人的关系以及人制作玉器的行为过程等。后续可尝试引入探地雷达、高光谱探测分析手段了解遗址的堆积分布情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明辉提出,受“碳库效应”影响,小南山遗址出土的海洋生物或渔猎人群标本测年数据可能存在较大误差。建议继续从多角度收集测年数据,分析“碳库效应”可能存在的影响,遗址年代认定须严谨。

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夏勇指出,小南山遗址公园作为一个开放式的场所,应尽快完善技防、人防建设,同时制定长期的保护规划。遗址保护需要尽快摸清小南山文化类型的分布,划定保护范围,以免破坏周围可能存在的遗址。考虑到几个阶段文化的年代上下限与气候环境和欧亚背景下的人群流动吻合,建议开展环境考古,建立本地区的标尺。

江西省地质调查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曾卫胜强调,小南山玉器玉料多样,不应以外观判断其产地,需要科学统计数据的支撑。小南山出土玉器主要以装饰品为主,不具备通灵属性,其产地、解玉砂来源、玉石分化的标志等问题也值得学界讨论。

玉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于明提出,国外也曾出现使用玉器的区域文化,可是否诞生了玉文化值得怀疑。玉玦等中国早期玉器的产生具有通灵属性,并非单纯的装饰品。七万年前欧亚大陆陆续出现的“玉器”多是与石器功能相似的器物,不具备思想或文化上的象征作用,不可视为玉文化的源头,玉文化源头的探寻应重视玉器在思想层面、精神世界的作用。

北京市政府参事、研究馆员于平认为,学界应在小南山遗址出土玉器考古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思考、探讨其背后承载的早期中华文明内涵与价值,建立多维度、跨学科的研究方式。此次论坛的学术成果应尽快整合、回馈给当地政府及相关单位,作为小南山遗址保护规划的学术支撑,建议将小南山遗址保护纳入属地“十五五”规划中。玉器专业委员会可以制定学术规划,提出打破行政区划的组团研究方向,对接相关属地机构,联合开展跨学科、跨区域的中华玉文化研究合作。

故宫研究院研究馆员张广文指出,玉文化在9000年前已经进入了成熟期,在此之前还应存在孕育期。小南山遗址玉文化成熟度较高,首先体现在玉材的选择具有标志性、材料较为珍贵,同时小南山还出现了对玉的崇拜。小南山玉器中,环、璧、璜等圆弧器物体系占据很大比例,玉器上充分体现出对于美感的追求。小南山玉器呈现

的基本特征影响了后世几千年的中华玉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表示，考古学结论具有相对正确性，要不断通过新材料进行完善。小南山出土玉器刷新了学界已有的传统认知，9000年前小南山就已经出现技术非常成熟的玉器，这表明中华玉文化起源还可向前追溯。小南山遗址出土玉器器型齐全，其中匕的出现尤其值得关注，匕应当是食器，结合新开流文化出土骨匕及鱼鳞窖藏发现，匕在小南山的出现证明中国进食传统的形成非常古老。

（四）闭幕式总结

经过为期两天的学术讨论，论坛于6月23日正式闭幕。论坛闭幕式上，山东大学教授栾丰实作大会总结发言，他认为与会学者在充分肯定小南山玉器的重大价值的基础上，主要围绕着六个方面的问题展开了讨论。第一是关于小南山玉器的文化内涵与特征问题，与会代表主要持两派观点，认为出土玉器以装饰功能为主或具有更丰富的社会含义，建议应在下一阶段工作中重视小南山遗址的玉器功能研究。第二是提出小南山玉器研究需要具有国际性视野，部分与会代表强调小南山遗址的地理位置特殊，其研究具有极强的国际性，研究视野应扩大到乌苏里江流域甚至整个东北亚地区，结合国际间的考古资料，进行宏观思考与阐释。第三是学者们对早期玉器的传播路线、玉料来源等发表了多种不同看法，我国东北地区玉器的功能、传承关系、传播路线、玉料来源等问题还有待于更多考古资料的补充完善。第四是认为小南山出土玉器对后世我国玉器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影响链条有待更多地域、时代环节上的衔接，建议放大小南山研究视野，剥离小范围视角，继续探索小南山玉器及玉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阶段当中的作用。第五是有关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问题的讨论，这一问题需要组织专门的学术会议加以讨论，随着研究的深入，旧、新石器时代分界的划分标准越发复杂、界限逐渐模糊，并非简单划一条界限即可解决。最后，此次论坛还对其他若干玉器问题展开讨论，如玉琮方圆结构中的哲理、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新石器时代玉器梳理、“敦煌玉”的概念等。此次“小南山玉文化论坛”成果颇丰，具有重要学术意义与价值。期待此次论坛能够进一步加强玉器研究多学科、多领域的合作，期待小南山遗址及出土玉器研究可以继续实现突破。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赵永军在闭幕致辞中指出，此次会议代表们交流的多个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充分展现了玉文化发展史、古代玉器加工技术以及科技检测等领域研究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诚邀全国各地、各领域学者加入小南山遗址研究队伍，加强跨地域、跨学科合作，共同推动黑龙江考古事业发展。

总之，此次小南山玉文化论坛不仅系统梳理了小南山遗址的考古发现、整合了最新研究成果，而且对推进中华玉文化研究、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及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小南山遗址出土玉器有力实证了九千年中华玉文化，为研究中国玉文化的起源、形成和传播以及史前人类社会等方面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进一步探寻中华玉文化源头、揭示和阐释中华文明发展脉络与内在特点提供了重要线索。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处]

（责任编辑：袁怡然）